

汪曾祺精选集

世纪文学·60家

shiji
wenxue
60jia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品·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1998

ISBN 0-226-08411-1

0-226-08412-9

0-226-08413-7

0-226-08414-5

0-226-08415-3

0-226-08416-1

0-226-08417-9

0-226-08418-7

0-226-08419-5

0-226-08410-3

0-226-08411-1

0-226-08412-9

0-226-08413-7

0-226-08414-5

0-226-08415-3

0-226-08416-1

0-226-08417-9

0-226-08418-7

0-226-08419-5

0-226-08410-3

0-226-08411-1

0-226-08412-9



shiji
wenxue
60jia

世纪文学 60 家

汪曾祺著

汪曾祺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精选集 / 汪曾祺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2
(2011.5 重印)

ISBN 978-7-5402-0715-9

I. 汪… II. 汪…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48 号

汪曾祺精选集

作 者 汪曾祺
编 选 者 季红真
责任编辑 张红梅 白利忠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1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焯、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 丁 帆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富仁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 郁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於可训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匡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 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中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 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谢 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雷 达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黎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出版前言

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桦、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

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2005 年 12 月 16 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各占 50% 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名单。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此书系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

季红真

一

汪曾祺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他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这一天是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人依照农时制定的重要节庆。

高邮地处苏北，气候温和民风淳朴，风景秀丽宜人。大运河穿流而过，流转南北货物，是来往客商云集的繁华大码头。名列全国第六大湖的高邮湖，水域辽阔丰盈，物产丰富。县城所处低洼盆地，在河与湖的水位之下，故又名孟城。高邮以秦代设驿站于高处而得名，至今仍然保留着旧址，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婉约派词宗秦少游故里在这里，文游台是他和苏东坡等文人雅聚的地方。明代散曲作家王磐、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诞生在这里，文风可谓昌盛。此外还出过两个短命的皇帝，倭寇曾经来犯。由于交通便利，历来都可以得风气之先。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清王朝的覆灭，截断了他由科举进身的功名之路，他以诚信为本的商业活动创立了一份家业。汪曾祺出生的时候，正值家道鼎盛，有田两千多亩，药店两家，房屋上千间。他的父亲受过新式

教育,多才多艺,兴趣兼容新旧,不仅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擅长运动,学过多种乐器,还养鸟、放风筝,是一个性情随和、兴趣广泛、富于同情心、能够平等待人、非常有情趣的人。汪曾祺从小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平易、温和的性格。从父辈到乡里,传统文化都有形无形地熏陶着他。他一满5岁,开明的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幼儿园,受到新式教育的启蒙。从小学开始,他就以文采著名。中学时代,父亲又为他延请了老师,辅导书法与桐城派的古文,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底子。1937年,日寇进犯江南,为避战祸,汪曾祺随家人在一乡间小庵居住半年,熟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萌生了文学创作的终生志向。而兼得新旧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思想和艺术的特点。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得以在闻一多、朱自清和沈从文等名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这里,他受到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也受到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启发。21岁,开始在校刊《文聚》上发表诗歌和小说。大学肄业后,在同学办的中学里教中文,结识施松卿并产生爱情。1946年起,在上海的民办致远中学教书两年。1948年,北上北平,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做助教的施松卿会合。失业半年后,找到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次年春天与施松卿结婚,4月,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这十年中,是他创作的发轫期,也是第一个高峰期。浓郁的乡愁与市井人物,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他和路翎被当时的批评界誉为两个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可谓一抬脚就迈进了文学史。

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积累生活素材,写出格调刚健的作品,1949年,汪曾祺随“四野南下工作团”离京,在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派往第二女子中学任副教导主任一年。1950年回到

北京,在《北京文艺》任编辑,创作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演出后获奖。1954年到《民间文学》当编辑,1958年因单位右派指标有余,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摘帽,留所劳动。次年,写出了《羊舍一夕》,表现底层少年的劳动生活与思想感情。1961年底,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期间,参加了样板戏《沙家浜》的编剧工作,“文革”结束以后,反复地被审查至1978年底。1979年以后,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一直笔耕到世纪末的暮年。

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

二

汪曾祺的一生是为艺术的一生。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以民间生活的题材引人入胜。五行八作中的能工巧匠、倒了运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小商人、邂逅的囚徒、见多识广的食客、淳朴的劳动妇女、亦僧亦俗的和尚、风流倜傥的名士,是最基本的人物。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丰富渊源,对于时代的独特回应。

他的思想有过明显的变化,一生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他正值民族与个人的双重危机,精神陷入极度的迷惘。另一方面,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风气,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的第一篇小说《复仇》是以仇雠和解为主题,而且写了两遍,可见他对于这个题材与主题的重视,其中是大有深意的。和平民主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的社

会理想，汪曾祺的业师中多有从学者到民主斗士的典型，比如闻一多和朱自清。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他在晚年的不少文章中，以自己切身的感受表达了对于残酷的文化专制制度的愤懑，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

经过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漫长的思想改造，他曾经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好，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八十年代，主流理论界正以人道主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希望有人能够写文章，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可见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者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这样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他理解、选择传统文化的枢机。他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普通人，甚至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作品中一再出现具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佛教的思想更是一开始就流露在他的笔下，“冤亲平等”的观念使他的《复仇》被选入佛教小说集，晚年撰写的《释迦谋尼》，更是充满了景仰之情。而所有的一切，又是以艺术为轴心，融汇在他的思想血脉中。他称赞孔子以自然中的潇洒生命状态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推崇《庄子》的艺术成就，多次写到具有充满世俗精神与艺术趣味的僧人，都可以看出艺术化了的丰富思想源泉，成为他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尽管他迷恋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有着明显的批判。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深受封建文化毒害与压迫的，另一种则是具有健康的人性。而这一类女性多数来自民间，属于乡

村和市民阶级的劳动女性。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风,不仅是对贞操观念的否定与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也包括了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此外,对于民间人物的赞美,也体现着他对于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对文化失范的痛切感受。有读者写信称赞他的《七里茶坊》,写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这比任何专家的评价都使他更高兴。他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用了“礼失求诸于野”的古语,反映了他对于民间文化所保留的先民道德的激赏。这些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他对于民众的愚昧有着深刻的洞察,愤怒于统治者的“神道设教”对于民众思想的钳制,说“愚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启蒙理想,融化在他的思想血脉之中,使他和二十世纪激进的民粹主义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以存在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美学。他在西南联大的自由阅读中,存在主义是重要的部分,而以之为背景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他的启发是决定性的,法国作家加缪、纪德,英国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西班牙作家阿左林,都是启发了他创作的重要人物。他在获得艺术滋养的同时,也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尽管在八十年代,他真诚地主张“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忏悔早年对于现代主义的心仪,但是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一直像暗流一样,隐蔽地存在于他的创作中。直到晚年,他才可以坦诚地说,一个完全没有困惑的人不是现代人,人经常是寂寞的、无聊的、孤独的,人都是孤儿。甚至劝告青年作家不要过早归于平淡,在作品中多注入一些悲悯。坦然地说,赞同加缪的观点,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

这样丰富的人文思想,使他的作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之间,以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个性化的表达。或者说,他在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大冲撞、大交汇处,确立了艺术的精神。在这里,艺术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三

汪曾祺是一个早慧的作家,这体现在他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美学理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小说文体的创作谈,基本的理想是强调文体的自然,要接近生活的样式,要尊重读者的感受。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中,他不断地在实践中修正、巩固着自己的艺术理想。

他在经历了帮派文学“假大空”的灾难之后,复出文坛之始,就以故乡昔日的生活场景、优美的抒情笔触,引起文坛的震动。他这个时期的美学理想接近儒家的诗教,强调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并且呼吁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他以风俗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把自己定位在中国的、抒情的人道主义。他阐释自己的美学宗旨是和谐、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写了大量关于语言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于汉语的独特领悟。民族文化为本位的艺术精神,贯穿在他最后十几年的创作中,他最后干脆宣称“我是用汉字思维”。可见他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从各个方面汇集,最终凝聚在对于民族语言的感悟。这就把价值观念、观物方式与审美理想,都落实在语言的形式中,在一般的文化思想和文学的表现之间找到了最科学的契合点。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必然要体现在语言风格中。

与此同时,他在忏悔早年对于西方现代派心仪的同时,又不

自觉地时时流露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神往。他在回忆沈从文与废名的文章中,阐述着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其中就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要素。前者的象征与含蓄,后者的跳跃式、非逻辑的意识流动,都是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特征。到了最后的岁月,他明确地说,要打通中外文学,立志衰年变法的主要途径是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手法。而这和他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因为他是以西方现代派文艺为参照系,对于传统文化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比如,他说“中国自有中国的意识流”,中国古代也有魔幻小说。他改写了不少《聊斋志异》和民间传说中的故事,就是这一美学理念的尝试。

他的美学自觉,还体现在他对于自己性格与气质的清醒认识。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品作家,即使有时间也写不出大部头的作品和华丽雄辩的论文。他反复强调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主流,也不想成为主流,只可能处于边缘。而且把自己的绘画与创作都归纳为“人间送小温”,真诚与美是他作品的核心。这样的自觉是艺术主体建构的重要内容,是一个作家的诚实,也是成熟的智慧。而且,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顺乎自己的天性,凭着感觉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学风格。真的性情也在这样的自觉中,像行云流水一样天然地流泻出来。这是他的作品能够被不同地域与职业的人激赏的重要原因。淳朴、自然、灵动带来的独特美学效果,都是基于率性而为的天性。他由这样的天性,达到对于文学本体的感悟。极言故乡和童年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一切文学发展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这就把自己的乡愁推向了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了诗性的心灵内涵。

汪曾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诗、文、字、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广博的艺术修养使他的美学理想建筑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中。

与他民族文化为本位的艺术理念相协调的,是传统的艺术遗产。他由自己的性情出发,对宝贵的艺术传统有着自觉的择取和会心的感悟。苏东坡的文论、归有光的小品、倪云林的平远小景、包世臣的书法理论等,都是他美学理想的活水源头。与士大夫文化并行的另一个源头,则是民间艺术的魅力。早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的作品中就出现过民间艺术家。他复出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西北民歌“花儿”的格律,他一再告诫青年作家要向民间文学学习,要学习民间的口语。他作品中的民间人物,常有不同的艺术才能,而且范围很广,从音乐、绘画、剪纸、戏剧到武术,都体现出民间艺术的鲜活形态。对于旧戏曲的时空形式、徐文长的《歌代啸》的荒诞成分、中国民间的罗汉雕塑,他也有着深入的领悟。这一切都使他的美学理想具有了丰沛的文化容量,沟通了多个艺术传统。

四

汪曾祺曾经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文体家。

这合乎他的创作实际。

他的一生所涉文体广泛,几乎达到了各体兼备。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戏剧与理论,都曾经是他运用自如的形式。就连他早年极力排斥的长篇小说,晚年的时候也试图尝试,他构思以汉武帝为主人公的小长篇,多年酝酿,删繁就简为三个戏剧场景,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就是他得心应手的散文小说,也在文体上多有探索,毫不重复。有的如诗如画,有的像方志,有的像游记,就是和朋友间的通信也写得温婉自如,充满艺术的感觉。

他多方面的文体实践,来源于高度的文体自觉,也是他审美

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文体的思索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部分。他在很多的场合都谈到文体的问题,而且把它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特别是小说的文体,他一开始就倾注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自然主义到了一些人的手里成了最不自然的主义,一般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小说。长篇小说的因果律和结构都是和生活相背离的;中篇小说就自然得多,犹如对面闲谈;而短篇小说更应该写得不像小说。它要在诗歌、绘画和电影等各门艺术中汲取营养,同时又和它们区别开来。他的小说是这种美学理念的成功实践。他早期的作品中,以主观性极强的意识流动串联起故事与人物,充斥着声音、线条、色彩与气味儿。晚年复出之后的小说则近于风俗画,大量的景物描写像空镜头一样,铺垫出人物活动的生活场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主张,首先是回到了诗画同源的古典美学理想,带给文体的变化是散文化和抒情性,对于以社会学为视野、以阶级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有着明显的突破。越到晚年他走得越远,引用海明威的话明确地说文学典型是撒谎,打破了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目的论。强调“一个小说的形式,是一种思索的方式,一种情感方式,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这就接续起萧红等现代作家们的文体探索,为日益僵化的小说文体注入了活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使中国小说从经历了八十多年的紧张痉挛中松弛下来,回归到它古老的文化源头,以边缘性、民间性与世俗性,来反映民众的心声。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绝无重复雷同之处。叙事的技巧与语言的风格,在变化中见出统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轻松地说,自己写散文是撷草打兔子,是写小说的副产

品。但是从取材到形式他也多有自觉。他推崇桐城派的散文，认为是集中国散文之大成的一个流派。他引用苏东坡的文论，强调文理的自然。他借助韩愈的文气说，以“气盛言宜”来说明语言与文气的协调。这样的美学理想，体现在他的散文中，就是文气的贯通与文体的自由。他的散文平白如话，却有平淡的诗意。所记人物、草木、山川、掌故、文物，多是娓娓道来，文体的变化则在随心所欲的闲谈风格中充满了情趣。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小品作家，恰恰是这一点使他沟通了中国古代小品文的一脉传统，也继承了周作人开创的中国现代散文中以平淡见长的一派散文风格。

他在文体上的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五

汪曾祺的艺术人生，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与文学艺术史，也联系着世界现代的文化思想与美学潮流。

西南联大的学风是他获益终生的财富，把文化的创造看作一个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的精神支柱。文化史的基本视角，从始至终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他的作品中。早在求学的青年时代，他为一个同学代写的作业中，就以画论诗分析李贺的生平与艺术。以豪华概括唐代的文化，从社会制度到器物形制都透着大气。一个悲哀的历史时刻来临了，这就是走向衰败的晚唐。李贺才华横溢，如果在盛唐自然不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他生活在晚唐则一生都贫困潦倒。他说唐代的诗人最喜欢用三种颜色，殷红、浓绿与赤金。盛唐的诗人把它画在白纸上，晚唐的诗人把它画在黑纸上。可以看出文化史的眼界，对个人才华中的主导作用。一直到晚年，他对于故乡风情的频